

# 文淵閣《四庫全書》詔令之 屬沿革探析及其所錄清朝官修 文獻略述

An Investigation into Zhaoling Zhishu of Wenyuange  
*Siku Quanshu* and Its Relevant Official Documents of  
Qing Dynasty

吳宇凡\*

Yu-Fan Wu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ultural Vocation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摘要 Abstract】

隨著數位人文研究日漸蓬勃，越來越多人注意到文獻背後脈絡（context）所蘊藏資訊之價值，而這類資訊多隱含於檔案纂修過程的選擇、編排、修改、增刪之方式，體現決策者之思維與想法，不僅呈現當朝社會權力結構與價值觀，更可為日後研究當朝執政者思維脈絡之第一手資料。為了進一步瞭解清代官方檔案的複雜情形，本研究即針對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詔令奏議類詔令之屬，及其所收錄清朝官方檔案纂修書籍進行探究，除深入瞭解文淵閣《四庫全書》詔令之屬沿革外，並參酌《四庫全書》及相關文獻資料、簿錄之書，介紹該類所收各書之內容範圍、制訂年代、編輯方式等，以期瞭解清官方檔案纂修情形，從而作為後續研究之參酌。

---

\*通訊作者：吳宇凡 wuyufan@ntut.edu.tw

投稿日期：2021年6月28日；接受日期：2022年4月26日

With the increases of digital humanities studies in recent years,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noticing the value of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context of documents, and this information is mostly implied in ways of selecting, arranging, modifying, adding and deleting materials in the process of data compilation, which reflect thoughts and ideas of decision makers. It not only reveals the power structure and values of contemporary societies, but also provides first-hand informa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on the thinking logics of different ruling parti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mplication situations of official archives of the Qing Dynasty, in this study, the compilations of Zhaoling Zhishu (詔令之屬) of Wenyuange *Siku Quanshu* (文淵閣四庫全書) and relevant official documents compiled by the Qing government were investigated, with the focus on not only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but also the content scope, formulation date, and editing method of each volume.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could serve as a significant reference for future studies.

### 【 關鍵詞 Keywords 】

檔案纂修；史部；四庫全書；文淵閣；詔令

Archives Compilation; Shibu; *Siku Quanshu*; Wenyuange; Zhaoling

## 壹、前言

個人、家族或機關團體為促進政令宣導、宣揚自身成就，或增加檔案使用之便利性，延長檔案保存壽命等各項因素，發展各式替代原件之使用方式，以供社會大眾近用，諸如氈版、攝影、縮微、出版、數位化等，讓使用者透過多元管道利用檔案，從而避免重複接觸原件造成檔案損毀，或因時空隔閡與科技落差所帶來的使用限制。在資訊科技未臻卓越的年代，檔案文獻資料的出版為各檔案產生、典藏單位所利用，即便數位化並建置資料庫已成為當前國內外檔案應用之主流，然仍有許多單位持續地進行，諸如國史館、中央研究院、國立故宮博物院等，則不難想見此方式受依賴及被重視之程度。

中國自古即有將政府執行公務所產生各項紀錄纂修付梓的作法，歷朝簿錄之書亦開專類以記錄此類型書籍，如宋尤袤《遂初堂書目》於集部列章奏類；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於起居注類後列詔令類，歌

詞類後列章奏類；元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於集部置章奏類；明高儒《百川書志》於集部列奏議類；明焦竑《國史經籍志》於集類列制誥、表奏類；《明史藝文志》列詔令類等，而收錄內容橫亙古今，如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詔令類即收錄《西漢詔令》、《東漢詔令》、《本朝大詔令》、《玉堂制草》、《中興玉堂制草》、《中興續玉堂制草》、《綸言集》、《中興綸言集》等八部，章奏類收錄《漢名臣奏》、《陸宣公奏議》、《令狐公表奏》、《范文正公奏議》、《諫垣存稿》、《富文忠劄子》、《從諫集》、《南臺諫垣集》、《范蜀公奏議》、《包孝肅奏議》、《呂獻可章奏》、《經緯集》、《傅獻簡奏議》、《范忠宣彈事》、《范德孺奏議》、《盡言集》、《王明叟奏議》、《丁鷺奏議》、《諫垣集》、《閑樂奏議》、《得得居士戇草》、《龔彥和奏議》、《石林奏議》、《連寶學奏議》、《若溪奏議》、《毗陵公奏議》、《陳國佐奏議》、《胡忠簡奏議》、《玉山表奏》、《陳正獻奏議》、《龔實之奏稿》、《南軒奏議》、《胡獻簡奏議》、《梅溪奏議》、《省齋歷官表奏》、《軒山奏議》、《北山戇議》、《李祭酒奏議》、《齊齋奏議》、《掖垣繳論》、《銀臺章奏》、《臺諫論》、《昆命元龜說》等四十三部，則可見中國歷朝對於官方紀錄編修的重視，使其成為書籍類目中的特殊形式。

這類以政府檔案或相關出版品為基礎的書籍，<sup>1</sup>多係官方所主導，存在著「纂修」與否的差異性。丁永奎與曹喜琛（1982）、劉耿生（2007）、胡鴻杰（2012）等人皆認為檔案編纂工作，可刪除、修正檔案原件上不影響正文內容的符號及格式，但必須忠於原文，轉錄時亦須與檔案原件正文相符，著重於「編」、「集」，而這樣的概念此亦與各界普遍對於「彙編」的想法如出一轍：內容得經選擇、編排，然卻不得為任何原因篡改、修正。從文獻學的角度而言，檔案「彙編」內容出於原文、同於原文的作法，即係以「替代」一次文獻的形式與功能為其出版核心；然而，歷代政府行政所產生的各項紀錄，為民間所難以接觸，相關出版即多以官方所主導，也因此受到政策、制度，以及過去編史、

1 近代檔案學對於「檔案」的理解，以資料形式的辨識，逐漸轉變為以脈絡（context）為依歸（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Archives, n.d.）。換言之，產生者因執行其職能，所製造、蒐藏、價購、交換、徵集之各項具永久保存價值之文獻、物件，因相同的產生背景而彼此聯繫，形成集合，得以作為事實稽憑、歷史還原之依據，則統稱為檔案，這也解釋了何以西方檔案館有元首座車、飛機及藝術品的入藏。在這樣的概念底下，本研究所稱檔案，即非著眼於名稱、形式，而係以政府機關職能脈絡底下之文獻、物件集合，以清政府為例，則包括諭旨、奏摺、起居注等。

簿錄方式的影響，致使這類文獻多具備「纂修」之行為而非僅以資料原始樣態呈現，更多時候隱含了人為斧鑿增刪的「修」的過程，形成政治性、政策性及思想性極強的二次文獻，這也導致了這類文獻並非以完整性為導向，而係隱含了豐富的編輯思維與想法於其中。<sup>2</sup>

綜觀過去歷史學、圖書館學及檔案學相關研究，鮮少針對古代以檔案或檔案纂修文獻為基礎之官修文獻進行探究，目錄、校讎、文獻學者亦鮮見論述此類書目，或以該類書籍係以直接抄錄而成，故相對於其他類部而不予重視。如吳哲夫（1993，頁127）所稱：「《四庫全書》史部所收錄詔令類圖書，除《唐大詔令集》及《兩漢詔令》外，率為各宗室各朝聖訓，用意全在『昭明彝訓，永垂成憲』，並無予以評議的必要」。然而，隨著數位人文研究日漸蓬勃，越來越多人注意到文獻背後脈絡所蘊藏資訊之價值，而這類資訊多隱含於文獻纂修過程的選擇、編排、修改、增刪之方式，體現決策者（當朝皇帝）之思維與想法，不僅呈現當朝社會權力結構與價值觀，更可為日後研究當朝執政者思維脈絡之第一手資料。

在這樣的概念之下，本研究有鑑清代文獻留存相對完整，利於文獻纂修來源的比對，從而探掘文獻中所隱含之官方脈絡，故以清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詔令奏議類詔令之屬為標的，除探討《四庫全書》纂修過程中該類屬之沿革，從而瞭解清官方對於一朝政府行政紀錄留存之想法，並參酌《四庫全書》及相關文獻資料、簿錄之書，兼論該類所收各書之內容範圍、制訂年代、編輯方式等，以期深入瞭解清朝以檔案或檔案纂修文獻為基礎之官修文獻，從而作為後續研究之參酌。

## 貳、詔令之屬定義、目的與類屬變遷

《四庫全書》係中國歷朝以來最具規模的官修叢書，其確切之編修時間至今各方仍有所扞格，若以安徽學政朱筠上奏提出《永樂大典》的輯佚問題、高宗諭令各地徵集遺書的乾隆三十七年（1772）作為初始，至最後一套《四庫全書》告竣之乾隆五十二年（1787）為止，全書撰修約歷時十六年。<sup>3</sup>該套叢書收錄內容自先秦至清乾隆前期，涵蓋了

2 本研究對於文獻層級分類概念，援引自張淳淳、張慧銖、林呈潢、嚴鼎忠與賴美玲（2003）《參考資源與服務》中所稱，包括零次文獻、一次文獻、二次文獻及三次文獻，其中，一次文獻為將大腦內之紀錄固化傳布的知識，二次文獻則為將一次文獻進行加值整理的知識。

3 有關《四庫全書》的編修時間多有紛歧，部分論述以乾隆三十七年（1772）下令徵書作為《四庫全書》編輯之起始，然部分論述則認為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庫全書館」正式成立方能稱之為編纂開始。結束時間亦有所差異，部分論述以乾隆

中國歷朝學術經典，分作經、史、子、集四部，部下細分四十四類，類下有屬，共收書三千四百餘種、三萬六千餘冊。其中，史部詔令奏議類所錄文獻，係以一朝行政相關資料為基礎所纂修而成，根據同治七年（1868）廣東書局本《四庫全書總目》所稱，收錄文獻共計三十九部，包括詔令之屬十部八百二十二卷，奏議之屬二十九部七百二十六卷，共計一千五百四十八卷，橫亙古今，實為中國歷代各朝發展留下重要史料（紀昀等，1969）。

所稱詔令，係天子布告臣民的下行文章。根據《四庫全書總目》史部詔令奏議類〈提要〉所稱，「記言記動，二史分司。起居注，右史事也，左史所錄蔑聞焉。王言所敷，惟詔令耳」（永瑤、紀昀，1986a，頁217-226），可知詔令為天子之言，與臣下上陳天子的上行奏議相對，係中國古代公行文體的一種，天子位高權重，所言之紀錄更係攸關國政發展之重要史料。而詔令輯錄之目的，根據《四庫全書總目》史部詔令奏議類〈提要〉所稱，在於「渙號明堂，義無虛發，治亂得失，於是可稽」、「俾易與紀傳互考焉」（永瑤、紀昀，1986a，頁217-226），即係以日後檢視上位者之得失為依歸。此外，察《聖祖仁皇帝聖訓》乾隆六年（1741）清高宗〈序〉中所稱：「懋遵祖訓，以無負皇考善繼善述之貽謀。顧金匱石室之藏，中外無得見者，爰命儒臣敬謹繕寫，授之剞劂，庶我皇祖聖祖仁皇帝建中表正、牖民覺世之言，昭垂寰宇；群工士庶，咸得漸摩於聖訓之崇閱，而率由無斁也，不亦庶歟！」（清聖祖，1986，頁145-169）則更進一步可知詔令輯錄之原因，除作為檢視得失之依據外，更係因皇室藏書外界無法知悉，為使世人得以觀覽，故而編修以達傳世之功。

在分類歸屬上，《四庫全書》編修以前，詔令與奏議並未合為一類，且歸屬類目不一。根據《四庫全書總目》史部詔令奏議類〈提要〉所稱：「《唐志》史部初立此門，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則移制誥於集部，次於別集，……，《文獻通考》始以奏議自為一門，亦居集末」（永瑤、紀昀，1986a，頁217），可知歷代簿錄之書將詔令與奏議相關書籍或置史部、或置集部，顯然在定位上仍存有疑義。然清四庫館臣對於部分書籍將詔令、奏議列入集部並不以為然，其持論：「夫渙號明

---

四十七年（1782）第一部《四庫全書》修成作為結束時間，亦有論述以七部《四庫全書》完成之乾隆五十二年（1787）作為結束，部分論述則係以乾隆五十七年（1792）複校工作完成視為結束。本研究考量書籍的發想與徵書為編修的一部分，故以乾隆三十七年（1772）下令徵書作為《四庫全書》編輯作為起始，爾後複校、補遺已係完成後之工作，故以七部書完成時間之乾隆五十二年（1787）作為結束。

堂，義無虛發，治亂得失，於是可稽，此政事之樞機，非僅文章類也，抑居詞賦，於理為褻。《尚書》誓誥，經有明徵，今仍載史部，從古義也」、「考《漢志》載奏事十八篇，列《戰國策》、《史記》之間，附《春秋》末，則論事之文當歸史部，其證昭然。今亦併改隸，俾易與紀傳互考焉」（永瑢、紀昀，1986，頁217），說明詔令、奏議為論事之文，並非僅係一般文章，且過去詔令多在本紀、奏議例歸列傳，相關正史初期並無詔令、奏議相關門類。換言之，從清四庫館臣的論述可知，無論係以古代對於各類屬原始定義的角度切入，抑或探究詔令奏議之本質，該類書籍皆應歸於史部，也因此改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移制誥於集部的作法，改從古義置於史部。四庫館臣的看法主要係以歷代詔令、奏議在本質上未曾改變的基礎上所提出，然章太炎《國學講演錄·史學略說》則持論此類文書產生的方式已隨朝代的更迭而變異，從而解釋不同朝代先後改列史部、集部之現象（章太炎，1995，頁129-130）：

詔令奏議，于古收入文集。帝王親制，入帝王一己之集；詞臣代擬，亦入詞臣一己之集。陸宣公奏議入《翰苑集》。宋人文集有內制、外制，是其證也。宋人然，明人亦然，至清則文與詔令奏議有分。蓋古人奏議美富，後世漸不成文。能文之士，不願以奏議入集，故分編也。又古人奏議，多出己手，近世惟京官無幕友為之捉刀。地方督撫所上摺，出幕友手者十七八。目不識丁之武夫，一為督撫，奏議亦有佳作。

章太炎的說法有別於四庫館臣的概念，認為造成二者歸屬出現疑義的主要癥結，在於古人奏議多為自行撰述，文筆佳且量豐，不如當代為幕友捉刀，已非作者之言，故過去可列一己之集，現在則較適合列於史部，以作為日後歷史查考之用，而這樣的說法也為《四庫全書》在詔令與奏議的分類歸屬上，導入不一樣的思維與解釋。

成書後之《四庫全書》在史部下置詔令奏議類，並分作詔令、奏議二屬分納群書。現代學者張舜徽（2002，頁88-90）則認為這樣的類目規劃有所局隘，提出《四庫全書》史部許多無法歸類之書如《名臣經濟錄》皆納入「詔令奏議」類屬之中，甚至《書目答問》亦併入《經世文編》而歸為此類，顯然在分類上存在疑義；其並認為《四庫全書》史部下應設「政制」、「政論」二類，而詔令奏議類應以「政論」代之，並將詔令、奏議、《經世文編》涵蓋其中，如此方能各得其所。姑且不論張舜徽所提分類是否適切，然其發現相關類別中參雜其他書籍的問題，

雖主要係以奏議之屬為主，亦顯示了《四庫全書》書籍分類在分析與利用上時應注意的限制與局限。

### 參、《四庫全書》詔令之屬及其所錄文獻沿革

從前述可以知道，各界對於詔令之屬應歸類於集部抑或史部存有疑義，即便四庫館臣最後持論將相關內容改置史部，然這樣的安排亦非一開始即已底定，從《四庫全書》相關書目所列書籍收錄情形，則不難發現相關類目係於編輯的過程中漸進修訂而成。清朝以詔令為基礎之官修文獻，並非自始即收錄於《四庫全書》史部詔令奏議類中，乾隆四十年（1775）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間所纂修完成的《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以下簡稱《初次存目》）中，<sup>4</sup>史部下並無詔令奏議類，而僅列詔令一類，且此類收錄書籍僅宋敏求《唐大詔令集》一百三十卷，並無任何奏議相關文獻（方鵬程、俞小明，2012，頁229）；然而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所纂修完成的摛藻堂本《欽定四庫全書薈要》（以下簡稱《薈要》）中，<sup>5</sup>史部分類雖仍與《初次存目》相同，僅置詔令類而無詔令奏議類，然收錄內容卻已與《初次存目》有所差異，其中包括《太祖高皇帝聖訓》四卷、《太宗文皇帝聖訓》六卷、《世祖章皇帝聖訓》六卷、《聖祖仁皇帝聖訓》六十卷、《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一卷、《聖諭廣訓》一卷、《世宗憲皇帝聖訓》三十六卷、《硃批諭旨》三百六十卷等八部四百七十四卷書籍收錄其中，雖與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收錄書籍相較多了《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一卷、《聖諭廣訓》一卷兩種，缺了《上諭八旗·十三卷、上諭旗務議覆·十二卷、諭行旗務奏議·十三卷》、《上諭內閣》一百五十九卷、《唐大詔令集》一百三十卷及《兩漢詔令》二十三卷，但此時已具《四庫全書》完稿收錄書目之雛形（永瑤、紀昀，2009，頁254-257）。

乾隆四十七年（1782）完成的《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以下簡稱《簡明目錄》）所列部類及收錄書籍已與《初次呈目》及《薈要》不同，《簡明目錄》在史部下刪除詔令類，另增列詔令奏議類，並於其下

4 據夏長樸（2012）推論，《初次存目》的編纂時間應在乾隆四十年五月至四十一年正月之間。

5 據吳哲夫（1976，73-74）研究，第一份《薈要》完成時間應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第二份《薈要》則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完成。

設置詔令與奏議兩項子目，其中詔令之屬有十部、八百二十二卷，奏議之屬有二十九部、七百三十七卷，與文淵閣本《四庫全書》、文津閣本《四庫全書》、文溯閣本《四庫全書》、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及浙江本《四庫全書總目》所錄內容及類屬設置幾近相同，惟部分書名及排列順序不盡相同（詳表1）。此外，《簡明目錄》史部詔令奏議類詔令之屬所錄書籍雖實際上為十部八百二十二卷，但於該類屬後結語卻稱有十二部、七百卷（見圖1），推測應為編修過程中刪削或增列部分內容而漏改，可知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薈要》完成之後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簡明目錄》完稿付梓之前，《四庫全書》收錄書籍內容仍有變動，最後定稿則幾成為《四庫全書》完稿收錄的版本。

在順序上，根據《〈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十三卷、〈上諭旗務議覆〉十二卷、〈諭行旗務奏議〉十三卷》書前〈提要〉所稱：「列聖御製及官撰諸書，並恪遵聖諭，冠於國朝著作之首，惟詔令奏議一門，例以專集居前，總集居後，而所錄漢唐詔令皆總集之屬，不應在專集之前，是以恭錄聖訓聖諭，弁冕此門，前代詔令列後焉」（清世宗，1986a，頁2），是故以清朝官方檔案或檔案纂修文獻為主體之官方文獻，在《四庫全書》史部詔令奏議類詔令之屬位於前列，而他朝者如《唐大詔令集》、《兩漢詔令》則置於後。其餘朝代之纂修書籍，根據四庫館臣對於歷朝詔令的看法，獨推漢、唐，縱然兩者詔令係輯錄自他書，「然匯而聚之，以資循覽，亦足以觀文章爾雅、訓詞深厚之遺」，兩宋以後相關詔令則「多見於奏議，內外制亦多散見於諸集」（清世宗，1986a，頁2），則可知僅收錄《唐大詔令集》、《兩漢詔令》二者，卻無他朝代纂修書籍之原因，即在於分散於奏議與集部，此亦呼應了章太炎前述類屬劃分之說法。

## 肆、《四庫全書》詔令之屬所錄清官修文獻

編纂完成後之文淵閣《四庫全書》，詔令之屬所錄清官修文獻包括《太祖高皇帝聖訓》四卷、《太宗文皇帝聖訓》六卷、《世祖章皇帝聖訓》六卷、《聖祖仁皇帝聖訓》六十卷、《世宗憲皇帝聖訓》三十六卷、《〈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十三卷、〈上諭旗務議覆〉十二卷、〈諭行旗務奏議〉十三卷》、《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一百五十九卷、《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三百六十卷等八種，共八部六百六十九卷（詳見表2）。

表1  
《四庫全書》及相關目錄史部詔令奏議類詔令之屬所錄書籍一覽表

書名	撰寫年代	類屬	部/卷	收錄書籍
《四庫全書初次 進呈存目》	乾隆四十年 (1775)	詔令類	一部一百三十 十卷	《唐大詔令集》一百三十卷
摛藻堂《欽定四 庫全書管要》	乾隆四十三 年 (1778)	詔令類	八部四百七 十四卷	《太祖高皇帝聖訓》四卷、《太宗文皇帝聖訓》六卷、《世祖章 皇帝聖訓》六卷、《聖祖仁皇帝聖訓》六十卷、《聖祖仁皇帝庭 訓格言》一卷、《聖諭廣訓》一卷、《世宗憲皇帝聖訓》三十六 卷、《硃批諭旨》三百六十卷
《欽定四庫全書 簡明目錄》	乾隆四十七 年 (1782)	奏 議類 詔 令 之 屬	類屬後結語 稱十二部 七百卷，但 實際為十部 八百二十二 卷	《太祖高皇帝聖訓》四卷、《太宗文皇帝聖訓》六卷、《世祖章 皇帝聖訓》六卷、《聖祖仁皇帝聖訓》六十卷、《世宗憲皇帝聖 訓》三十六卷、《〈上諭八旗〉十三卷、〈上諭旗務議覆〉十二 卷、〈諭行旗務奏議〉十三卷、《上諭內閣》一百五十卷、《兩漢 《硃批諭旨》三百六十卷、《唐大詔令集》一百三十卷、《兩漢 詔令》二十三卷
《四庫全書總目》	不詳 (經考 據應為乾隆 四十六年 (1781)二 月十三 前)	奏 議類 詔 令 之 屬	十部八百二 十二卷	《太祖高皇帝聖訓》四卷、《太宗文皇帝聖訓》六卷、《世祖章 皇帝聖訓》六卷、《聖祖仁皇帝聖訓》六十卷、《世宗憲皇帝聖 訓》三十六卷、《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一百五十卷、《世宗 憲皇帝硃批諭旨》三百六十卷、《〈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十三 卷、〈上諭旗務議覆〉十二卷、〈諭行旗務奏議〉十三卷》、 《唐大詔令集》一百三十卷、《兩漢詔令》二十三卷

表1 《四庫全書》及相關目錄史部詔令奏議類詔令之屬所錄書籍一覽表(續)

書名	撰寫年代	類屬	部/卷	收錄書籍
武英殿本	乾隆五十四年(1789)	詔令奏議類詔令之屬	十部八百二十二卷	《太祖高皇帝聖訓》四卷、《太宗文皇帝聖訓》六卷、《世祖章皇帝聖訓》六卷、《聖祖仁皇帝聖訓》六十卷、《世宗憲皇帝聖訓》三十六卷、《〈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十三卷、〈上諭旗務議覆〉十二卷、〈諭行旗務奏議〉十三卷》、《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一百五十九卷、《世宗憲皇帝批諭旨》三百六十卷、《唐大詔令集》一百三十卷、《兩漢詔令》二十三卷
浙江本	乾隆六十年(1795)	詔令奏議類詔令之屬	十部八百二十二卷	《太祖高皇帝聖訓》四卷、《太宗文皇帝聖訓》六卷、《世祖章皇帝聖訓》六卷、《聖祖仁皇帝聖訓》六十卷、《世宗憲皇帝聖訓》三十六卷、《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一百五十九卷、《世宗憲皇帝批諭旨》三百六十卷、《〈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十三卷、〈上諭旗務議覆〉十二卷、〈諭行旗務奏議〉十三卷》、《唐大詔令集》一百三十卷、《兩漢詔令》二十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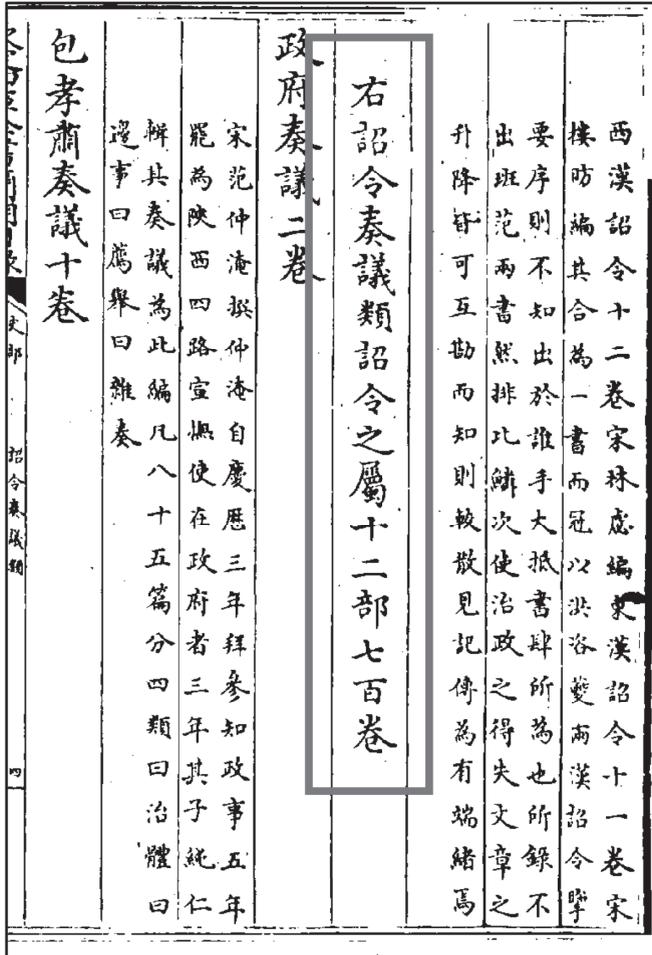


圖1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詔令奏議類詔令之屬後結語

資料來源：永瑤、紀昀（1986b，頁229）。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就其屬性差異，茲區分為「歷朝聖訓類書籍」，諸如《太祖高皇帝聖訓》、《太宗文皇帝聖訓》、《世祖章皇帝聖訓》、《聖祖仁皇帝聖訓》、《世宗憲皇帝聖訓》，以及以皇帝諭旨及所批閱之奏摺、奏本等文獻為纂修依據之「上諭硃批類書籍」，包括《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上諭旗務議覆、諭行旗務奏議》、《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等。

表2

文淵閣《四庫全書》詔令之屬所錄清官修文獻一覽表

順序	書名	卷數	完成時間	收錄內容	編著者	備註
1	太祖高皇帝聖訓	4	康熙二十五年編，乾隆四年刊布	26類92則	清聖祖御編	高宗純皇帝製序文
2	太宗文皇帝聖訓	6	順治末年世祖章皇帝編次未竟，康熙二十六年聖祖仁皇帝續成，乾隆四年刊布	23類111則	清世祖敕編，清聖祖續編	高宗純皇帝製序文
3	世祖章皇帝聖訓	6	康熙二十六年編，乾隆四年刊布	32類113則	清聖祖編，徐乾學等奉敕纂修	高宗純皇帝製序文
4	聖祖仁皇帝聖訓	60	雍正九年編，乾隆六年刊布	32類1900餘則	清世宗編，翰林大學士等奉敕纂修	高宗純皇帝製序文
5	世宗憲皇帝聖訓	36	乾隆五年編	30類916則	清高宗編，翰林大學士等奉敕纂修	高宗純皇帝製序文
6	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	13	雍正九年編	雍正元年至五年上諭	和碩莊親王允祿等奉敕編	
	上諭旗務議覆	12				
	諭行旗務奏議	13				
7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	159	雍正七年編，雍正九年告成，世宗憲皇帝即位後續編，乾隆九年告成	雍正元年至十三年上諭	和碩莊親王允祿等奉敕編 和碩和親王弘書奉敕續編	
8	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	360	雍正十年編，乾隆三年告成	雍正元年至十三年硃批奏摺	清世宗編，鄂爾泰、張廷玉等奉敕纂修	冠以世宗憲皇帝諭旨，殿以高宗純皇帝序文

資料來源：永瑤、紀昀（1986b，頁217-226）。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一、歷朝聖訓類書籍

清高宗有感於歷朝先祖事蹟無以流傳，遂編聖訓以傳後世。察《聖祖仁皇帝聖訓》乾隆六年（1741）清高宗〈序〉稱：「懋遵祖訓，以無負皇考善繼善述之貽謀，顧金匱石室之藏，中外無得見者，爰命儒臣敬謹繕寫，授之剞劂，庶我皇祖聖祖仁皇帝建中表正膺民覺世之言昭垂寰宇，群工士庶咸得漸摩於聖訓之崇閱而率由無斁也，不亦庶歟。」（清聖祖，1986，頁145-169），故可知聖訓的輯錄即係因皇室藏書外界無法知悉，為使世人得以觀覽，故而編修以達傳世之功。此外，《世宗憲皇帝聖訓》在乾隆五年清高宗〈序〉中亦提及，「自古人君有盛德大業者其規畫周詳，而詒謀悠遠，則必敷之彝訓以明定保之徵，紀之簡編以著經綸之蹟，非徒為一時事功計也，亦將以示後嗣昭法守焉」（清世宗，1986e，1-17），則可知聖訓纂修之原因，係以期待作為後代子孫定國安家之準則。

有關文淵閣《四庫全書》詔令之屬所錄各朝聖訓之編輯依據，各界多有扞格。順治十二年（1655）二月，內翰林國史院侍讀黃機奏請編纂太祖、太宗聖訓時稱，「自古仁聖之君，必祖述前謨，以昭一代文明之治。年來纂修太祖、太宗實錄告成，伏乞皇上特命諸臣詳加校訂所載嘉言善政，仿《貞觀政要》、《洪武實訓》諸書，緝成治典，恭候皇上欽定鴻名，頒行天下。尤望於萬幾之暇，朝夕省覽，身體力行，紹美前休」（鄂爾泰，1985，頁702），提及清代聖訓纂修之初始建議，係採用實錄上「所載嘉言善政」進行分類、選輯而成，然這樣的說法並無法直接說明清代各朝聖訓纂修的來源係以實錄為依歸。趙軼峰（2020，頁180-191）〈製造聖王——讀清《太祖高皇帝聖訓》〉亦稱，「雖然表面看去，聖訓內容主要從實錄中選取——清代文獻多用如此說法，今人因循，但同一班底同時修纂之書屬於同一工程產品，二者或者共享依據來源，或者同為編纂者構造，稱聖訓以實錄為據，其實牽強。」即便聖訓編輯來源仍為各界所質疑，但不可否認的是，聖訓的輯錄來源並未若《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等文獻，以清朝皇帝批閱之奏摺、奏本等檔案作為纂修依據來的單一，而係以多元資料為來源，諸如諭旨、奏摺等一次文獻，抑或編輯、抄錄而成之二次文獻。歷朝聖訓類書籍包括《太祖高皇帝聖訓》四卷、<sup>6</sup>《太宗文皇帝聖訓》六卷、

6 《太祖高皇帝聖訓》四卷，乾隆四年高宗純皇帝製序文後刊布，內容冠以康熙二十五年清聖祖仁皇帝及乾隆四年高宗純皇帝序文，收錄上諭九十二則，分作

7《世祖章皇帝聖訓》六卷、<sup>8</sup>《聖祖仁皇帝聖訓》六十卷、<sup>9</sup>《世宗憲皇帝聖訓》三十六卷，<sup>10</sup>共計五部一百一十二卷。

---

二十六類，包括卷一：敬天、聖孝、神武、智略、寬仁；卷二：論治道、訓諸王、訓群臣；卷三：經國、任大臣、用人、求直言、興文治、崇教化、勤修省、節儉、慎刑、恤下；卷四：輯人心、通下情、明法令、鑒古、賞功、昭信、誠逸樂、謹嗜好。首卷起始於「敬天·天命三年戊午閏四月壬午」，末卷結束於「謹嗜好·天命十年乙丑八月癸巳」。見清太祖（1986，頁1-13）。

- 7 《太宗文皇帝聖訓》六卷，然編次未竟，聖祖仁皇帝於康熙二十六年續成，實際刊布則至乾隆四年，內容上冠以康熙二十六年聖祖仁皇帝及乾隆四年高宗純皇帝序文，收錄上諭一百一十一則，分作二十三類，包括卷一：論治道、訓諸王；卷二：訓群臣；卷三：謙德、寬仁、智略；卷四：求賢、求言、輯人心、恤民、勸農、興文教；卷五：訓將、勵將士、懷遠人、訓諸藩；卷六：恤降、招降、訓舊勞、敦睦、節儉、謹嗜好、禁異端。首卷起始於「論治道·天聰九年乙亥五月己巳」，末卷結束於「禁異端·崇德七年壬午五月戊寅」。見清太宗（1986，頁39-51）。
- 8 《世祖章皇帝聖訓》六卷，乾隆四年刊布，內容冠以康熙二十六年聖祖仁皇帝及乾隆四年高宗純皇帝序文，收錄上諭一百一十三則，分作三十二類，包括卷一：論治道、敬天、聖孝、聖學、謙德、節儉、儆戒；卷二：敦睦、諭群臣、求言、納諫、任官；卷三：考績、選舉、誠飭臣下；卷四：理財、恤民、賑濟、重祀典、禮前代、褒忠節；卷五：興文教、諭將帥、招降、諭外藩、仁政、體群情；卷六：安民、慎刑、懲貪佞、除弊、宥過。首卷起始於「論治道·順治十年癸巳正月丙申」，末卷結束於「宥過·順治十一年甲午二月乙丑」。見清世祖（1986，頁97-109）。
- 9 《聖祖仁皇帝聖訓》六十卷，翰林大學士等奉敕纂修，乾隆六年刊布，內容冠雍正九年世祖憲皇帝及乾隆六年高宗純皇帝序文，收錄上諭一千九百餘則，分作三十二類，包括卷一：聖孝；卷二：聖德；卷三：聖德；卷四：聖德；卷五：聖學；卷六：聖治；卷七：聖治；卷八：聖治；卷九：聖治；卷十：敬天；卷十一：法祖；卷十二：文教；卷十三：武功；卷十四：武功；卷十五：武功；卷十六：武功；卷十七：武功；卷十八：武功；卷十九：武功；卷二十：武功；卷二十一：恤民；卷二十二：恤民；卷二十三：任官；卷二十四：廣言路；卷二十五：嚴法紀；卷二十六：嚴法紀；卷二十七：理財；卷二十八：慎刑；卷二十九：慎刑；卷三十：重農桑；卷三十一：興禮樂；卷三十二：省方；卷三十三：治河；卷三十四：治河；卷三十五：治河；卷三十六：澄敘；卷三十七：賞賚；卷三十八：蠲賑；卷三十九：蠲賑；卷四十：蠲賑；卷四十一：蠲賑；卷四十二：積貯；卷四十三：飭臣工；卷四十四：飭臣工；卷四十五：飭臣工；卷四十六：飭臣工；卷四十七：訓將士；卷四十八：訓將士；卷四十九：訓將士；卷五十：褒忠節；卷五十一：恤舊勞；卷五十二：廣幅員；卷五十三：弘制度；卷五十四：弭盜；卷五十五：牧政；卷五十六：禮前代；卷五十七：柔遠人；卷五十八：柔遠人；卷五十九：柔遠人；卷六十：柔遠人。首卷起始於「聖孝·康熙元年壬寅八月戊午」，末卷結束於「柔遠人·康熙五十九年庚子九月甲申」。見清聖祖（1986，頁145-169）。
- 10 《世宗憲皇帝聖訓》三十六卷，內容冠以乾隆五年高宗純皇帝序文，收錄九百十六則，共分三十類，包括：卷一：聖德；卷二：聖德；卷三：聖孝；卷四：聖學；卷五：聖治；卷六：聖治；卷七：聖治；卷八：敬天；卷九：法祖；卷十：文教；卷十一：武功；卷十二：敦睦；卷十三：用人；卷十四：恤臣下；卷十五：愛民；卷十六：愛民；卷十七：恤兵；卷十八：察吏；卷十九：訓臣工；卷二十：訓臣工；卷二十一：勵將士；卷二十二：廣言路；卷二十三：理財；卷二十四：慎刑；卷二十五：重農桑；卷二十六：厚風俗；卷二十七：治河（附水利）；卷二十八：蠲賑；卷二十九：蠲賑；卷三十：積貯；卷三十一：謹制度；卷三十二：崇祀典；卷

在呈現上，與實錄以時間次序編排的方式有所不同。根據《太祖高皇帝聖訓》在乾隆四年清高宗〈序〉中提及，「聖祖嘗命儒臣編輯聖訓四卷，類聚條分，燦然明備」（清太祖，1986，頁1-13）；《太宗文皇帝聖訓》在乾隆四年清高宗〈序〉中進一步說明，「順治中嘗因記注舊文纂修聖訓一書未竟厥緒，聖祖仁皇帝特命儒臣詳加編輯事以類分，凡二十有三，言以條舉，凡一百一十有一，彙為六卷，體要著明」（清太宗，1986，頁39-51），可知清「歷朝聖訓類書籍」係以類為經，時間為緯，起始於類別名稱，相同類別內以日期為序，同年論文則列月、日作標題，同月論文則列日作標題。值得注意的是，文淵閣《四庫全書》詔令之屬所收錄清歷朝聖訓類書籍，係經過編者修改、刪削之輯錄，因此與其他文獻所呈現者不盡相同。例如《太祖高皇帝聖訓》論文與實錄所錄者即有所差異，以《太祖高皇帝聖訓·卷一》〈聖孝·天命九年甲子四月甲申〉為例（清太祖，1986，頁7-8）：

上以遼陽既定，建都東京，奉移景祖、顯祖諸陵安葬於東京之楊魯山，設太牢、焚楮幣。上詣二祖陵，奠酒行禮，祝曰：「吾征明，復祖父仇，已得遼東廣寧，祇移寢園，永安斯土，惟我祖考，仰達天地，垂福佑焉。」

而《太祖高皇帝實錄》中之原文則較為詳細（華文書局，1964，111-112）：

上以遼陽既定，建都東京，奉移景祖、顯祖、孝慈皇后及皇妃、皇伯父、皇弟、皇子諸陵墓於東京，命族弟鐸弼、王善、貝和齊往至祖居虎欄哈達之赫圖阿喇地，謁祖陵及皇后、皇妃陵。鐸弼等遵旨，先以太牢祭告畢，乃奉景祖、顯祖、孝慈皇后梓宮，昇以黃輿；暨皇伯父禮敦巴圖魯、皇弟貝勒達爾漢巴圖魯舒爾哈齊、青巴圖魯穆爾哈齊、皇叔塔察篇古之子貝勒祐爾哈齊靈櫬，昇以朱輿，日祭以太牢。將至，上率諸貝勒大臣，令軍士被甲冑、執器械，出城迎二十里外。至皇華亭，上及諸貝勒大臣軍士，悉俯伏道左，俟景祖、顯祖暨孝慈皇后靈輿過，乃起。至東京城東北四里之楊魯山，預建寢殿以安葬焉，設太牢、焚楮幣，妥侑諸靈。上詣二祖陵，奠酒行禮，祝曰：「吾征明，復祖父仇，已得遼東廣寧，祇移寢園，永安斯

三十三：篤勳舊；卷三十四：褒忠節；卷三十五：綏藩服；卷三十六：弭盜。首卷起始於「聖德·雍正元年癸卯七月丙午」，末卷結束於「弭盜·雍正十一年癸丑四月乙丑」。見清世宗（1986e，頁1-17）。

土，惟我祖考，仰達天地，垂福佑焉。」其繼妃富察氏、及皇子阿爾哈圖土門貝勒褚英胤，亦同移於此。

由此可知內容的真實性與完整性，纂修後之《太祖高皇帝聖訓》並不如實錄內容，而這也導致過去清史學者多輕此而重實錄之內容；若考量《太祖高皇帝聖訓》內容之收錄係經過當朝者決斷，期以後代傳頌，也因此哪些內容被收錄、哪些被刪除，體現了當朝者（皇帝）思維喜好與當下價值觀，以之與實錄進行比較分析，對於進一步瞭解執政者之思想而言，則可補相關資料之闕如。

## 二、上諭硃批類書籍

此類別文獻係以清朝皇帝發布政令之文書，及其批閱之奏摺、奏本等作為纂修依據之文獻。文淵閣《四庫全書》所錄上諭硃批類書籍，包括《〈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十三卷、〈上諭旗務議覆〉十二卷、〈諭行旗務奏議〉十三卷》、《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一百五十九卷及《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三百六十卷等，共計三部五百五十七卷。

### （一）《〈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十三卷、〈上諭旗務議覆〉十二卷、〈諭行旗務奏議〉十三卷》

《〈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十三卷、〈上諭旗務議覆〉十二卷、〈諭行旗務奏議〉十三卷》，係雍正九年和碩莊親王允祿等奉敕所編，將〈上諭八旗〉十三卷、〈上諭旗務議覆〉十二卷及〈諭行旗務奏議〉十三卷三集合為一書（清世宗，1986a）。其中，自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以後所奉諭旨與八旗政務相關者收入〈上諭八旗〉；前錄諭旨，附載八旗大臣所議，則稱〈上諭旗務議覆〉；前錄八旗大臣所奏，後錄諭旨者，則稱〈諭行旗務奏議〉。關於編錄的原因，雍正九年〈表〉提及（清世宗，1986b，頁3-5）：

鴻恩廣被幾微，必加之籌畫纖悉，備致其周詳。或進百爾於彤廷面遵懿訓，或下十行之單詔手捧宸章，或命讜論敷陳而疇咨博採，或因憲章偶軼而渙號重申，凡茲敦本礪俗之良模，悉協開國經邦之舊典，允宜編為令申，宣示各旗，口頌心維，共闡明倫聖之訓，耳濡目染，咸欽立政之天心，僉曰大哉。王言萬邦是式，矧茲密邇內府，文誥宜頒。爰命擇吉選員，即行開館編次，年經月緯。謹據事以成書，律著例明，亦分條以紀要政，先旗務，煥兵農禮樂之章程；令播禁城，合官屬弁丁而懲勸則。是彝是訓，誦皇極之敷言，永昭一代太平之治。

此外，在呈現上，各論文以時間為類，依次為序，〈上諭八旗〉首卷起始於「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末卷結束於「雍正十三年八月初三日」，〈上諭旗務議覆〉首卷起始於「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末卷結束於「雍正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諭行旗務奏議〉首卷起始於「雍正元年五月初八日」，末卷結束於「雍正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惟〈上諭八旗〉時間列於論文之首，其餘二者時間列於論文之末。

## （二）《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一百五十九卷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一百五十九卷，係雍正七年世宗憲皇帝俯允廷臣之請，命和碩莊親王允祿繕錄刊布，內容涵蓋世宗憲皇帝登位之初至雍正七年上諭內容，然世宗即阼後，高宗純皇帝命和碩親王弘晝編次雍正八年至十三年上諭，乾隆六年告成，原以每月別為起訖，且不標卷數，然重修後依舊次釐為一百五十九卷（清世宗，1986c）。原書本未題書名，後因該編內閣宣示者居多，因而題曰《上諭內閣》，以別於《上諭八旗》。關於輯錄的原因，《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書前〈提要〉云（清世宗，1986e，頁1-17）：

伏考國家舊制，始置內三院，後乃改置內閣，以出納綸音，恭逢列聖膺圖，乾綱獨握。自增用奏摺以後，皆高居紫極，親御丹毫，在廷之臣，一詞莫贊，即硃批諭旨是也。其題本由內閣票擬者，遇事涉兩歧，輒恭繕雙簽以請，無敢擅專。至于訓誥特頒，則指授內直諸臣於禁廷具草。有纖微未達聖意者，必御筆塗乙添注，亦罔敢以私意參其間。鑒定之後，降付內閣，宣布中外而已。更無由如前代宰輔假批答以竊威福者。此一百五十九卷，名為臣工所繕錄，實與御劄手敕無以異。勵精宵旰之懷，謹持魁柄之意，萬世可伏讀而見之也。

可知《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係以硃批訓誥等上諭作為輯錄依據，並稱「名為臣工所繕錄，實與御劄手敕無以異」，則顯見編輯特色。而在呈現上，全書以時為類，依次為序，以時間開頭，後標示該時間內容總數，如〈卷二·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後即接「上諭三十四道」，論文已不見完整上奏體例。

## （三）《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三百六十卷

《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三百六十卷，係鄂爾泰、張廷玉等於雍正十年奉勅校刊，成刊於乾隆三年，冠以世宗憲皇帝《諭旨》，殿以皇上

御製《後序》，其內容恭錄世宗憲皇帝批答，俾供知所陳之得失，為清歷朝皇帝硃批奏摺中唯一收錄《四庫全書》之中（清世宗，1986d）。其書前〈提要〉云（紀昀等，1986，頁3-4）：

秦漢以後，章奏既興，載于史者不過有省有不省、有行有不行者。所謂鳳尾諾，不過一字，未有連篇累牘，一一手勅報之者。唐宋以後，多出代言，故諸臣文集、或以批答為內制之一體。如宋太祖於截木之章、宋真宗於鄰壤之字，皆偶然涉筆，不過數言，亦未有句櫛字比、標注甲乙、無幾微之不到者。至于集彼書囊積為巨帙，多至三四百卷而敷奏報聞、無煩訓示者不與焉；內外章牘由內閣奏進者，亦不與焉，尤書契以來所未嘗聞見者矣。

可知《硃批諭旨》纂修出版的另項原因，在於清朝世宗皇帝批閱奏文係親力親為，其用功之深、撰文之豐，非往昔歷朝皇帝可比擬，因而可積文成書。在呈現上，《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修改過去纂修以時為類的做法，改以提奏者為類，依時為序，讀者可依人尋文，內容部分，則根據《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書前〈提要〉云（紀昀等，1986，頁3-4）：

所載臣工奏摺凡二百二十三人。多者以一人分數冊、少者以數人合一冊。所奉硃批一一恭錄。或在簡端、或在句旁、或在餘幅。少者數十言，多者每至數百言。其肯綮之處、經御筆圈出抹出者，尤為詳悉。無不循名責實、斥偽求真。或即委而知源，或見微而識著。

有關編輯之方式，以《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為例，比較《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所輯錄奏摺原件，可以發現輯錄後之奏摺內文，或有刪修、或有潤飾，直接塗改於奏摺之上，且可看出編輯者在許多符號上的利用，如「」內之文字代表刪除，在編輯完成的書籍中就不會看到這些文字（見圖2）；因此觀看奏摺檔案可發現纂修的痕跡與做法，而這類纂修痕跡，根據《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書前〈提要〉所稱，臣工僅為繕錄，實際上係為皇帝所修（清世宗，1986e），則更顯相關纂修文獻對於瞭解當朝執政者思維想法之關聯與重要性。

從清帝之諭旨及其批閱之奏摺、奏本等作為纂修依據之文獻可以看出，《四庫全書》收錄皆以雍正時期檔案為主體，推論這樣的原因應與清世宗擴大採行奏摺制度有關。奏摺制度源起於康熙年間，及至雍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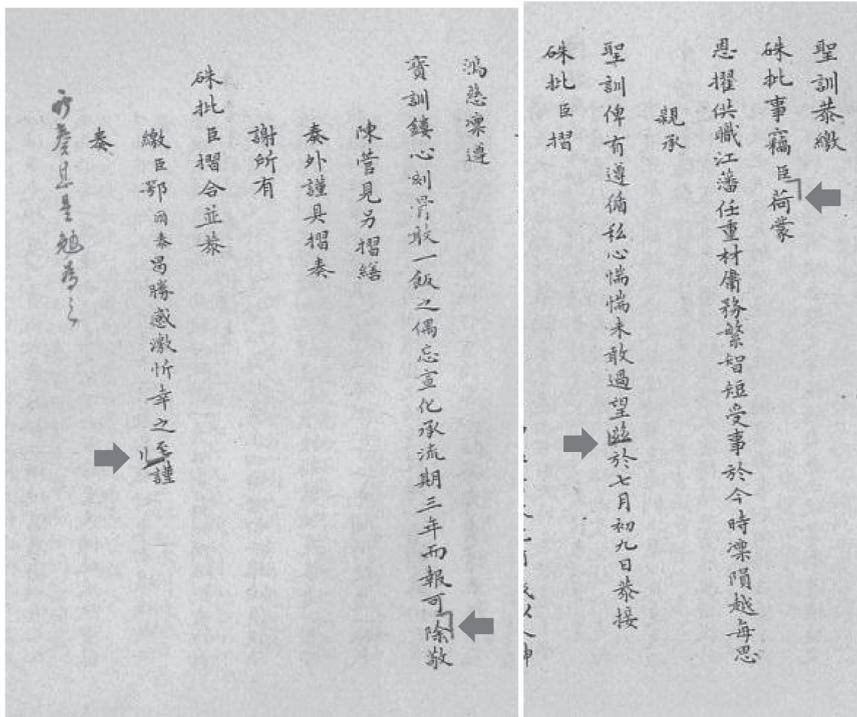


圖2 鄂爾泰雍正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奏摺

資料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1977，頁903）。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二輯。  
臺北：編者。

年間擴大採行，並大舉進行奏摺回收，不允許提案人留存（清聖祖，1986）。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清宮內檔案激增，這樣的結果則反映在利用相關資料進行纂修的書籍，《〈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上諭旗務議覆〉、〈諭行旗務奏議〉》、《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遂而產生。

## 伍、結語

本研究關注《四庫全書》詔令之屬及其所錄清官方纂修之文獻，起因於「檔案」及其相關文獻係如何被保存、應用、修改、傳播與分類的關照。檔案係人們生活實踐所產生，更為政府業務推行之媒介，不僅反映社會環境之時空脈絡，更體現當下行政程序與結構，對於日後深入研

究與考察相關歷史助益甚鉅。然而，檔案的產生過程程序繁雜且多為自然發生，因此副本鮮少，且其發展脈絡的不可重製性，凸顯了檔案的稀有與珍貴，也致使為了維護珍貴的檔案，而加劇了檔案利用的困難性。將檔案付梓出版解決了檔案複製與應用的問題，然而，過去常忽略彙編、纂修過程所進行的選擇、編排、修改、增刪，使得檔案與檔案之間的關係產生了變化，由原本自然構成的連結，因編輯者的思維喜好，而重新構建了以其為核心的脈絡關聯，換言之，檔案出版所呈現的真實已經與檔案產生當下有所差異，轉而體現了編輯者的思想體系，這也導致了相關書籍對於瞭解編輯者的想法而言，成為最直接的材料。

文淵閣《四庫全書》詔令之屬即係以檔案或檔案纂修為基礎之文獻作為收錄核心，其中所收錄清朝官修文獻，共計八種六百六十九卷。藉由文獻所使用原始材料進行對照，除可見大量刪修情形外，由於這類官修文獻係由皇帝親編，文獻所呈現的內容上仍可見皇帝斧鑿纂修痕跡，透過皇帝依其認知所進行之篩選、分類、增刪、編排，後人則可藉此瞭解執政者對於前朝各項施政的看法、重視及認同與否，無論是從思想史、政治史、制度史研究的角度而言，皆具有一定程度的參考價值，換言之，其價值並非無可評議之處，從宏觀的視角而言，甚而開拓了後續研究道路，補當朝者思維探究資料之闕如。

對於文獻本質的認識與瞭解，一直以來都是圖書館學、檔案學、資訊科學實務與學術上之要務，尤其在計量、大數據、資料探勘及數位人文等相關研究逐漸擴展至各人文領域之下，更係凸顯文本研究的重要性，可以說若不能掌握文本特性，將無法進一步分析文本內容。本研究藉由文獻的分析與爬梳，希冀補足過去對於該類屬之沿革研究之闕如，並期待探討該類屬所收錄清朝檔案或檔案纂修文獻為基礎之官修文獻之內容與特徵，從而作為後續研究之前沿。茲就本研究發現與觀察歸納如下。

## 一、清詔令之屬內容本質與古代有所差異，所收錄類別顯示宣揚武功之目的

清《四庫全書》之編纂係以重新檢視《永樂大典》所啟，並擴大其規模使之含括各類型文獻，除作為文化、知識的保留與傳承外，許多論者更提及清政權的彰顯與穩固，藉由《四庫全書》的纂修從而宣傳政治武功、檢視並導正反動內容與情緒、固化社會思想。清《四庫全書》詔令之屬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所收錄文獻以清代為大宗，畢竟為官修文

獻，且內容為皇帝詔令，也因此的目的上與其說是政權穩固，更多時候則在於彰顯。

值得注意的是，《四庫全書》史部包括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別史、雜史、詔令奏議、傳記、史鈔、載記、時令、地理、職官、政書、目錄、史評等類別，實錄類相關文獻多收錄於編年類中，然與實錄屬性近似之歷朝聖訓及上諭硃批等清官修文獻，即便內容為編年體制，仍納入詔令之屬，則顯見此類屬無關形式與內容，更著重於清朝執政者相關文獻是否適合與其他文獻置於同一類屬中，也因此該類屬在本質上較偏重於清室武功之宣揚。換言之，清《四庫全書》詔令之屬所錄文獻之內容與本質，有別於歷代簿錄之書所錄，雖稱以檢視上位者之得失為依歸，然實際上則係以達傳世之功，成為較為特殊的存在。

## 二、歷代以檔案及相關資料為基礎之文獻多為官方纂修，目的在替代原件成為「檔案」，呈現古今對於一次文獻概念上的差異性

清《四庫全書》詔令之屬所錄文獻，其來源多元，包括一次文獻的上諭、奏摺等，以及經編輯、抄錄各類文獻所形成的檔冊、實錄等二次文獻，前者為傳統概念下之檔案，然後者則係將二次文獻再加工所致。無論係上述哪一種文獻，四庫館臣顯然並未將這類文獻視作史書，而係將其視之為與紀傳互考之參考資料；換言之，所產生之文獻係作為「替代」原始文件的角色，而這樣的概念與當下各界所稱「彙編」的本質又有所悖逆。所謂「彙編」，係以真實呈現原件內容為依歸，其特徵在「替代」原始文件，然各朝代官修檔案文獻多具有纂修的過程，使得這樣的文獻在取代原件上存在著脈絡轉移與歷史還原的真實性問題。

歷代政府在檔案保存上，或為檔案形成上，多以檔案及相關資料為基礎進行纂修，所形成之文獻則視之為「檔案」並予以保存，這樣的情形在各朝多有所見，也反映了古今對於「一次文獻」的概念的差異性。中國歷代檔案的保存係以原始檔案「刪繁摘要」為主，也因此經過編輯之文獻完成後，原始檔案則多束之高閣或予以銷毀，民國初年國務院、外交部等機關並制定有編檔辦法，由業務承辦人員針對檔案進行刪減整理與纂修，完成後之文獻則視之為「檔案」予以保存。從文獻學的角度而言，過去習慣上將檔案視之為一次文獻，然而中國歷代對於「檔案」形成方式上的差異，致使古今對於「一次文獻」的概念有所不同，使得這類經過「纂修」而成的文獻，即為政府執行職能所產生的第一手資

料，但仔細觀察則可知係介於原始文件與史書中間的特殊形式，既保留了原始文件的部分樣態，又具備了斧鑿增刪的痕跡，隱含了編輯者的思維於其中。

### 三、現存文獻保留完整清官方詔令纂修的歷程與記錄，對於相關內容的分析與研究，將有助於瞭解在位者的思維與想法

魯迅（2005，頁497）在介紹《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時說道，「其實是現有的較好的書籍之批評，但須注意其批評是『欽定』的」。魯迅的說法點出了《四庫全書》最為人詬病的缺點，但在思想史及數位人文研究上，文獻中特定個人過多的涉入不見得不好，許多時候所隱含的個人特質與特色，因其所留下眾多的痕跡而更容易挖掘出其特質與思維。

透過資訊分析方法導入人文領域研究，成為近年來相關領域研究中廣泛受到關注的方式。然而，如何尋找適切的文本進行分析，以探掘有別於過往的脈絡資訊，成為每個研究者戮力探尋的方向。項潔、陳麗華、杜協昌與鍾嘉軒（2015）藉由斷詞技術，針對古代類書進行分析與研究，使之還原過去知識建構脈絡；同樣的概念下，清《四庫全書》詔令之屬所錄清官修文獻中，呈現了在位者（皇帝）親自纂修完整之成果，而對應之來源，諸如諭旨、硃批奏摺、實錄等，更完整地保留了纂修的歷程與痕跡，相較過去以一個朝代的文獻來分析受到官方政策的影響，推論特定朝代風格來得更為直接，並可專指特定編輯者，對於瞭解特定在位者（皇帝）的思維想法、風格、喜好而言，有著更直接的幫助，並可補過去相關資料的不足。

## 誌謝

感謝審查委員具體且深入的建議，使本文得以修正闕誤、更臻完善。

## 參考文獻

- 丁永奎、曹喜琛（1982）。檔案史料編纂學概要。北京：檔案出版社。  
【Ding, Y. K., & Cao, X. C. (1982). *Dang an shi liao bian zuan xue gai yao*. Beijing, China: Dang An Chu Ban Shee. (in Chinese)】
- 方鵬程、俞小明（編）（2012）。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史部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國家圖書館。【Fang, P. C., & Yu, X. M.

吳宇凡：文淵閣《四庫全書》詔令之屬沿革探析及其所錄清朝官修文獻略述

- (Eds.). (2012). *Si ku quan shu chu ci jin cheng cun mu (shi bu yi)*.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in Chinese)】
- 永瑢、紀昀（1986a）。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總目（總目二史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Yong, R., & Ji, Y. (1986a).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zong mu (zong mu er shi bu)*.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
- 永瑢、紀昀（1986b）。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Yong, R., & Ji, Y. (1986b). *Qin ding si ku quan shu jian ming mu lu*.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
- 永瑢、紀昀（2009）。四庫全書薈要總目提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Yong, R., & Ji, Y. (2009). *Si ku quan shu hui yao zong mu ti yao*. Beijing, China: Ren Min Wen Xue Chu Ban Shee. (in Chinese)】
- 吳哲夫（1976）。四庫全書薈要纂修考。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Wu, C. F. (1976). *Si ku quan shu hui yao zuan xiu kao*. Taip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 (in Chinese)】
- 吳哲夫（1993）。四庫全書史部奏議類圖書著錄之評議。在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編），國立臺灣圖書館建館七十八年暨改隸中央二十週年紀念論文集（頁127）。臺北：編者。【Wu, C. F. (1993). *Si ku quan shu shi bu zou yi lei tu shu zhu lu zhi ping yi*. I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Branch (Ed.), *Guo li tai wan tu shu guan jian guan qi shi ba nian ji gai li zhong yang er shi zhou nian ji nian lun wen ji* (pp. 127). Taipei: Editor. (in Chinese)】
- 紀昀等（編）（1969）。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五·史部十一·詔令奏議類。在四庫全書總目（第2冊，頁1175-1200）。臺北：藝文印書館。【Ji, Y. et al. (Ed.). (1969). *Qin ding si ku quan shu zong mu juan wu shi wu. Shi bu shi yi. Zhao ling zou yi lei*. In *Si ku quan shu zong mu* (Vol. 2, pp. 1175-1200). Taipei: Yee Wen Publishing. (in Chinese)】
- 紀昀等（1986）。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提要。在清高宗（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16冊，頁3-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Ji, Y. et al. (1986). *Shi zong xian huang di zhu pi yu zhi. ti yao*. In Qing Gao Zong (Ed.),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 416, pp. 3-4).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
- 胡鴻杰（2012）。檔案文獻編纂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Hu, H. J. (2012). *Dang an wen xian bian zuan xue*. Beijing, China: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夏長樸 (2012)。《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初探——編纂時間與文獻價值。漢學研究, 30(2), 165-198。【Hsia, C.-P. (2012). A study of the preliminary catalogue of the Si Ku Quan Shu for Imperial Presentation: Its date of composition and textual value. *Chinese Studies*, 30(2), 165-198. (in Chinese)】
- 章太炎 (1995)。國學講演錄。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Zhang, T. Y. (1995). *Guo xue jiang yan lu*. Shanghai, China: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清太宗 (1986)。太宗文皇帝聖訓·卷一。在清世祖、清聖祖 (編),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411冊, 頁39-51)。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Qing Tai Zong (1986). *Tai zong wen huang di sheng xun*. Juan yi. In Qing Shi Zu & Qing Sheng Zu (Ed.),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 411, pp. 39-51).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
- 清太祖 (1986)。太祖高皇帝聖訓·卷一。在清聖祖 (編),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411冊, 頁1-1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Qing Tai Zu (1986). *Tai zu gao huang di sheng xun*. Juan yi. In Qing Sheng Zu (Ed.),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 411, pp. 1-13).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
- 清世宗 (1986a)。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上諭旗務議覆、諭行旗務奏議·卷一。在清高宗 (編),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413冊, 頁2)。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Qing Shi Zong (1986a). *Shi zong xian huang di shang yu ba qi, shang yu qi wu yi fu, yu xing qi wu zou yi*. Juan yi. In Qing Gao Zong (Ed.),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 413, p. 2).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
- 清世宗 (1986b)。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上諭旗務議覆、諭行旗務奏議·表。在清高宗 (編),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413冊, 頁3-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Qing Shi Zong (1986b). *Shi zong xian huang di shang yu ba qi, shang yu qi wu yi fu, yu xing qi wu zou yi*. Biao. In Qing Gao Zong (Ed.),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 413, pp. 3-5).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
- 清世宗 (1986c)。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首、卷一。在清高宗 (編),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414冊, 頁1-22)。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Qing Shi Zong (1986c). *Shi zong xian huang di shang yu nei ge*. Juan shou, juan yi. In Qing Gao Zong (Ed.),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 414, pp. 1-22).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

清世宗（1986d）。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卷首、卷一上、卷一下。在清高宗（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16冊，頁1-81）。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Qing Shi Zong (1986d). Shi zong xian huang di zhu pi yu zhi. Juan shou, juan yi shang, juan yi xia. In Qing Gao Zong (Ed.),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 416, pp. 1-81).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

清世宗（1986e）。世宗憲皇帝聖訓·卷一。在清高宗（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12冊，頁1-17）。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Qing Shi Zong (1986e). Shi zong xian huang di sheng xun. Juan yi. In Qing Gao Zong (Ed.),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 412, pp. 1-17).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

清世祖（1986）。世祖章皇帝聖訓·卷一。在清聖祖（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11冊，頁97-109）。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Qing Shi Zu (1986). Shi zu zhang huang di sheng xun. Juan yi. In Qing Sheng Zu (Ed.),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 411, pp. 97-109).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

清聖祖（1986）。聖祖仁皇帝聖訓·卷一。在清世宗（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11冊，頁145-169）。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Qing Sheng Zu (1986). Sheng zu ren huang di sheng xun. Juan yi. In Qing Shi Zong (Ed.),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 411, pp. 145-169).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1977）。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二輯）。臺北：作者。【National Palace Museum. (Ed.). (1977). *Gong Zhong dang yong zheng zhao zou zhe* (Vol. 2). Taipei: Author. (in Chinese)】

張淳淳、張慧銖、林呈潢、嚴鼎忠、賴美玲（2003）。參考資源與服務。臺北：國立空中大學。【Chang, C. C., Chang, H. C., Lin, C. H., Yen, T. C., & Lai, M. L. (2003). *Can kao zi yuan yu fu wu*. Taipei: National Open University. (in Chinese)】

張舜徽（2002）。四庫提要敘講疏。臺北：臺灣學生書局。【Chang, S. H. (2002). *Si ku ti yao xu jiang shu*. Taipei: Student Book. (in Chinese)】

華文書局（編）（1964）。大清滿洲實錄、大清太祖高皇帝實錄合訂本。臺北：作者。【Hua Wen Shu Ju. (Ed.) (1964). *Da qing man zhou shi lu, da qing tai zu gao huang di shi lu he ding ben*. Taipei: Author. (in Chinese)】

- 鄂爾泰 (1985)。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E, E. T. (1985). *Qing shi lu shi zu zhang huang di shi lu*. Beijing, China: Zhong Hua Shu Ju. (in Chinese)】
- 項潔、陳麗華、杜協昌、鍾嘉軒 (2015)。數位人文視野下的知識分類觀察：兩部官修類書的比較分析。東亞觀念史集刊，9，229-286。doi:10.29425/JHIEA.201512\_(9).0014【Hsiang, J., Chen, L.-H., Tu, H.-C., & Chung, C.-H. (2015). Observing the evolution of worldview through digital humaniti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Leishu.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in East Asia*, 9, 229-286. doi:10.29425/JHIEA.201512\_(9).0014 (in Chinese)】
- 趙軼峰 (2020)。製造聖王——讀清《太祖高皇帝聖訓》。故宮博物院院刊，10，180-191。【Zhao, Y. F. (2020). Zhi zao sheng wang—Du qing “tai zu gao huang di sheng xun.” *Palace Museum Journal*, 10, 180-191.】
- 魯迅 (2005)。魯迅全集 (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Lu, X. (2005). *Lu Xun quan ji* (Vol. 8). Beijing, China: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劉耿生 (編) (2007)。檔案文獻編纂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Liu, G. S. (Ed.). (2007). *Dang an wen xian bian zuan xue*. Beijing, China: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Archives. (n.d.). What Are Archive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ica.org/en/what-archive>

# An Investigation into Zhaoling Zhishu of Wenyuange *Siku Quanshu* and Its Relevant Official Documents of Qing Dynasty

**Yu-Fan Wu**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ultural Vocation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Introduction

Individuals, families, or organizations have developed various alternatives to the original documents for public use, such as cyanotype, photography, microfilm, publication, digitization, etc., in order to promote policies, claim their own achievements, or enhance the convenience of using archives and extend the lifespan of archives. This measure of providing various alternatives will prevent damage to original documents caused by repeated access, and will remove the limitation of use due to time and space differences and technological gaps. Even before digitization and database construction have become the mainstream of archival applications in Taiwan and overseas, many institutions have started these practices and continued to do so, such as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國史館), Academia Sinica (中央研究院), and National Palace Museum, etc., which reveals that this approach is heavily relied upon and highly valued.

With the increases of digital humanities studies in recent years,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noticing the value of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context of documents, and this information is mostly implied in ways of selecting, arranging, modifying, adding and deleting materials in the process of data compilation, which reflect thoughts and ideas of decision makers. It not only reveals the power structure and values of contemporary societies, but also provides first-hand informa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on the thinking logics of different ruling parties. However, few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selection,

arrangement, modification, addition, and deletion in the process of data compilation, and data compilers tend to edit data and reconstruct contextual relationships according to their own preferences and interests. In other words, the natural links tended to be altered, and the realities presented in modified archives tend to be different from the original ones, for revealing data editors' thinking logics. Thus, relevant documents and works become the direct materials for understanding data editors' thoughts.

## Method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mplication situations of official archives of the Qing Dynasty, in this study, the compilations of Zhaoling Zhishu (詔令之屬) of Wenyuange *Siku Quanshu* (文淵閣四庫全書) and relevant official documents compiled by the Qing government were investigated, with the focus on not only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but also the content scope, formulation date, and editing method of each volume.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could serve as a significant reference for future studies.

## Results

The core collection of Zhaoling Zhishu of Wenyuange *Siku Quanshu* is based on archives or compilation of archives, consisting of eight types of official archives of the Qing Dynasty, in a total of 669 volumes. By comparing the original materials and the compilations, we can see there is a great deal of deletions and revisions made by the emperors themselves. The emperors made the selection, classification, addition, deletion, and arrangement of archives according to their perceptions, thus the archives revealed how these emperors thought about the policies and decisions made by administrations of previous dynasties. We could see whether these emperors considered the policies important, and whether they approve or disapprove of particular policies. From a macroscopic perspective, we can say that this research points a way for future studies and fills the knowledge gap regarding the thinking logics of rulers in different dynasties and eras.

Study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nature of documents has long been a

practical and research priority in librarianship studies, archival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specially in an era when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metrics, big data, data exploration, and digital humanities in studies in various humanities fields, which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textual research. It can be said that only when we identify the text characteristics can we further analyze the text content.

## Conclusions

The findings and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summarized as below. (1) The nature of Zhaoling Zhishu of Qing Dynasty is differed from that of ancient times, with a goal of demonstrating its military achievements; (2) Most of the compilations based on archives and related materials were compiled by the official authorities, with a goal of replacing the originals as “archives,” indicating that there were different conceptions of primary documents between the ancient and present times; (3) The existing compilations preserved the complete history and records of compilations made in Qing Dynasty, and the analysis and study of relevant contents will help understand the thinking logics and thoughts of different rulers.

